

道是社会的独立的理论系  
牵制和制约作用。就一隅  
全面考察，则多偏颇。

我认为道与选的关系  
是相对二分与合一的  
有合，合中有分，合相  
限于儒家，而是思想

选  
下  
考  
文  
稿

刘泽华



刘泽华 著

洗耳斋文稿

中华书局



B1288219

M21497/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洗耳斋文稿/刘泽华著.-北京:中华书局,2003

(南开史学家论丛·第2辑)

ISBN 7-101-03973-1

I.洗… II.刘… III.①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文集  
②中国-古代史-战国时代-文集③中国-古代史-秦汉时代-文集 IV.  
①D092.2-53 ②K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7701 号

责任编辑:王守青

## 洗耳斋文稿

刘泽华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河北廊坊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2 印张·530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定价:38.00 元

ISBN 7-101-03973-1/K·1645

# 南开史学家论丛

---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敦书 白志良 冯尔康 刘泽华

范 曾 李治安 陈振江 张国刚

主 编 刘泽华

副主编 张国刚 (常务) 李治安

# 总序

南开史学家论丛第二辑,即将问世。编委会诸学友认为我在南开开园已度过55个春秋,算是老南开了,让我说几句话。我和本辑作者相处数十载,对他们的学术研究领域和成就以及生活方式是了解的。

环境对于一个人的成就影响极大。南开历史系在二十世纪后半期,教师多来自海内外各名校,而以西南联大师生为主体,故得以吸收西南联大的优秀学术传统,融合各校的学术特色,形成南开自己的独特风格,即“求真,求新,求通,求用”,其声望饮誉学界。学习生活在这里的人,耳濡目染,受益匪浅。

这里,象许多著名学府一样,学术气氛特别浓厚。请进来,走出去,海内外的学术交流异常活跃。

这里,师生们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孜孜不倦地追求先进的知识和学问,树立起美好前途的信念。

这里,教学科研并重,新老教师认真执着教鞭,几十年如一日,传道授业解惑,而其作品不断出现。他们最大的兴趣就是探讨历史的真实。

在这样的历史学术环境中,学人以几位大师为楷模,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智。

南开的确铸造了许许多多卓有成就的历史研究者。

这一辑论丛的著者,是在南开园成长起来的,是人民共和国培养出来的。他们进入南开时,风华正茂。如今两鬓都有了银丝,成为著

年的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领域和风格各异,各有特色,依年龄顺序为:

张友伦,原先专门研究国际共运史,后专治美国史,这一《孔见集》包括史学、国际共运史、美国工人运动史、美国社会制度史、美国西部史和农业史等诸方面的内容。

俞辛(焯)是研究日本史的,其《躬耕集》包括两大方面内容,一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的外交政策,如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外务省、李顿调查与外务省;一是日本与孙文、辛亥革命的关系。

冯尔康,专攻清史,是改革开放后,致力于社会史研究的复兴首倡者之一。这一《顾真斋文丛》包括四个方面内容,即社会阶层和社会经济结构、群体、区域社会、社会问题。

王敦书曾研究过日本史,后集中精力于世界古代史。这一《贻书堂史集》包括日本史、外交史、太平洋战争史、世界古代史、希腊罗马史、亚细亚生产方式方面的内容。

刘泽华主治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这一《洗耳斋文稿》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是论述战国阶级与身份的,一是论述历史认识论的。

陈振江先研究中国古代史,后改治中国近代史。这一《发微集》包括传统文化与文明转型的历史轨迹,从洋务新政到立宪政体改革的历程,义和团运动和中国社会的变迁,古代文明觅踪等。

范曾集学者、画家、诗人于一身,是画坛巨擘,又是诗、词、赋、散文和书法的能手。这一《抱冲斋艺史丛谈》,涉及非常广泛的领域,如人和自然,人文关怀,美学、绘画的内在规律、历史人物和治学心得等,其文字极为优美。

文如其人。各文集都反映了作者的个性和学术历程。可以说,每个人都经历了几十年的磨炼。学如聚沙积薪,在学术道路上是要付出心血和精力的。我认为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认真读书,勤

奋探索和思考,真实严谨地做学问。比如,范曾习惯于早晨5时起床,即伏案读书、画画、写字。这是1994年我到欧洲讲学,住在他的巴黎别墅所亲眼看到的。治学总得有敬业勤奋精神。

关于学术问题,总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七部书,其中有的观点已得到共识,如刘泽华论战国时期授田制,其论点已为学界所公认。范曾的庄子显灵记,获得了广泛的赞许。而有的论述可能有异议,这是正常现象。我想不管怎样,论丛的出版,是有利于文化积累,对历史研究有启迪和推动作用,不知知识者以为然否。

南开历史系创建于1923年,今年恰是80周年。长江后浪推前浪,我期望一代一代的年青人继承南开的优秀学术传统并发扬光大。

魏宏运

2003年8月29日



刘泽华，1935年生，河北省石家庄人。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政治史、知识分子史、历史认识论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著作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被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中国的王权主义》、《先秦士人与社会》。主编并与人合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被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的整合》、《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等。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经选举曾任历史系主任。曾兼任校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评聘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委员。曾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议组成员。



# 自序

2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那本书也是一部论文集,不过与一般的论文集又有所不同,所收的论文是按照主题和一定的逻辑关系进行排列与组合的,近似一本专著。每篇之后原本都注明了文章的出处,后来编辑同志建议有个总的说明即可,从形式上尽量减少隔断之感,我采纳了。这样做无疑是一种尝试,但事后总有一点遗憾。因为不注明出处,显示不出成文的时间,会有文气不同之感,加上用语的时间差别,容易引起读者产生某些疑问。在此向读者表示歉意。同时向读者说明,凡属《中国的王权主义》已收的论文,本书不再重复,这样本书与《中国的王权主义》可并行于书肆而不相重。

这部文稿包括三方面的文章:一是有关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二是有关战国阶级身份状况的;三是有关历史认识论的。这三方面大体也是我多年来用力最多的地方。

我先说说三部分的写作背景与动机。有人说,做学问要排除一切功利目的,要为学术而学术,不管人间烟火。这种说法或许是为了强调学术的纯洁和神圣,但果真有这样的纯学术吗?或许有,不过在我的想像中,这只是神仙的事。我没有入道,更谈不上道行的修养,与上述之论不在一个层面上。我是一个俗人,烟火缭绕,所以还是讲点我的俗事和俗心吧。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起,我不停地呼吁应加强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从学科来说,以50年代初进行的大学院系调整、取消政

治学系为标志,可以说拦腰斩断了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有关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只在哲学史中附带一笔,不绝如线。反观那一段历史,只有几位先生在冷宫里默默地坚守着这块园地。80年代伴随着政治学的恢复,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重新见了天日。但直到今日,与其它学科相比它依然是滞后的。这同政治改革相对滞后是一致的。政治改革的滞后带来政治思想史——政治观念研究的滞后,反过来,政治思想史——政治观念研究的滞后又影响于政治改革的滞后。两个“滞后”形成了非良性循环。这种现象亟需改善,而作为学人责无旁贷地应该进行政治思想史——政治观念的基础研究。对这种现象怎么看和怎么做,学人各有各的视角和选择,不过我与我的合作者在认真地思索并付诸实践。说起来,早有智者指出,封建主义的东西对我们社会和政治生活有深重的影响,这个判断是相当确切和中肯的。我说不上这就是“将令”,但我是朝这个方向努力了。政治思想史的内容多多,可以开发出许多珠玉珍宝,不过我做的仅仅是想分辨什么是封建专制主义!

在我看来,诚如前贤所指出的,封建主义在最近以前的历史里有过大泛滥,把我们多数人都弄糊涂了,在号称明白事理的知识界也少有例外。试问,我们参与的“忠”字化运动难道都是“违心”的?难道不是我们骨子里还保留这封建主义的基因?别人的事归别人,我那时是经过认真严肃的“理性”思考而参与的。封建主义把我们那么多人裹进去了,难道还未等站起来,仅拍拍屁股就能说清理干净了?对此我是怀疑的。我们不能忽视封建主义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十分沉重,还会“死的拖住活的”!在我看来,没有认真的新一轮的认识和争鸣,分辨清什么是封建主义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有时也许理论上是清楚的,但行动上还打着陈旧的印记,不可不警惕呀!

二十年来我与合作者在不言之中自然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小学术集体,我们前后出版了二十几部著作,还有为数可观的一批论文。其

中有我写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中国的王权主义》；有我任主编与诸位同道共著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传统政治文化丛书》、《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的整合》等；另外合作者都有专门著作问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一时段，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特别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方面，我们的投入是最多的；相应的，我们的学术收获与学术个性也为社会与学界所承认。拙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在中韩建交前被全文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我们共著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也被译成韩文，第一卷前不久在韩国发行，第二、第三卷也将陆续出版。我们的著作还被不少大学有关专业列为研究生的必读书或参考书，对此也感到相当欣慰。本书所收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论文就是我收获的一部分。为了给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观念的变革提供更丰富的精神资料，我再次呼吁学界要有更多的人来关心中外古今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应该有多种多样的著作问世，以供读者选择。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冷清局面应当改变，我相信也一定会改变！

本书收入的有关战国阶级身份的几篇文章是上一个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写就的。1976年惩治“四人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再认识历史的机遇。当时我与南开的同仁对历史上阶级关系的简单化、格式化问题提出需要进行再认识。有过那一段历史经历的人差不多都是在一个固定化的大格式中安排历史，这个大格式就是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与斗争。就阶级分析方法而言，直到今日我依然认为是应该尊重和坚持的，至少我个人是如此。但是历史上的实际的阶级构成远不是这样简单化和格式化。其实马克思早就说过，古代的阶级是由等级来体现的。说来有点奇怪，我们那时天天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此却不能贯彻于实际的历史过程。1976年的事变给我们提供了机会，于是我们提出要对历史上的等级和身份进行研究。《南开大学学

报》的主要编辑刘健清等同志支持我们的想法，从1978年初开设了专栏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本书的《论战国“授田”制下的公民》就是这个专栏的第一篇文章。我曾用力清理了战国时期的社会等级和身份，写成了一组文章，这次有机会集中在一起。

关于历史认识论的文章，与1976年清除“四人帮”和其后的思想解放有着更直接更密切的关联。在“文革”时期我这个人说不上有独立思想，但有时多少有点疑问和焦躁情绪。这里讲一件往事。根据最高指示，1974年7月至8月在北京召开了“法家著作注释会议”，我有幸出席。这次会是由姚文元等一伙控制与操办的，是在“评法批儒”高潮中举行的。哲学与史学界已被“解放”的不少名家被纳入这次会议。会议的政治背景我不知道，会议的表面主题是选择哪些是法家的著作及如何注释等问题，但会议上的主调却是“儒法斗争贯彻到现在”，“要用儒法斗争为指导重新改写历史”。在会议一边倒的气氛中，我却颇为迟钝、迂腐和固执，竟认为上述说法有违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在会上会下一再嘟嘟囔囔儒法斗争与现在的路线斗争不是一回事，更不能用儒法斗争重新改写历史。我发言时“科教组长”（比现在的教育部长可能还大）迟群打断我的发言，要我立即终止。我也不知从哪来了一股蛮劲，非要把话讲完，为此还有几句争执。会后有人说我好大胆子，敢与迟群这位知识分子的“克星”对撞。其实我哪里有这么胆量，我当时不知道他就是迟群！1977年《历史研究》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部在清理那次会议档案时，果然发现有整我的专项资料，包括我私下的议论。回想起来，我实在侥幸，没有被派上“用场”。这件事说明我当时确实有些“憋气”。所以1976年粉碎“四人帮”正合吾意，接连写了多篇批判“四人帮”的文章，这部分的第一篇《打碎枷锁 解放史学》就是其中之一。1978年6月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在天津召开“全国史学发展规划筹备会议”，参加会的有几百人，我有幸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为什

么我这个不见经传的老助教(我当时已四十有三,当了二十多年的助教,可以说“老”了吧!)能被列入“特邀”之列?我没有打听过,我猜测同我在1974年“法家著作注释会议”上的所谓的“反潮流”有关。由于我是“特邀”代表,在我作“打碎枷锁 解放史学”发言时,受到会议的主持者黎澍先生的特别关照,打破当时发言限30分钟的规定,让我放开讲,不受时间限制。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我的发言确实引起了相当的“震动”,以至有人说我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好在有黎澍等先生的支持,我没有感到有什么压力,《历史研究》又很快发表了我的发言全稿。接着,1979春又发表了有针对性的《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一文。文章刊出后收到多封读者来信,其中有怒斥我们的文章意在“砍旗”云云。就实而论,我们没有那种意图,但意在打破“劝君少骂秦始皇”的禁区则是昭然的,因此有这种指责也在情理之中。对史学界有更大影响的是《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一文。这篇文章在1979年春于成都召开的“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上作为大会的主题发言之一而引起史学界、哲学界的广泛关注。我们文章的主题是要从“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的束缚中走出来,而这恰恰是此前不可置疑的“铁则”,是全国卷进“文革”热潮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因此文章一出就引起理论界热烈的争论,在不长的时间内发表的文章数以百计。中央党校出版社曾辑录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论文集出版,可资参考。现在回头看,以上三篇文章的“八股”气还十分浓重,但我一字不改收入了本集,以保留那段历史的文本。也希望没有那段经历的年轻读者理解我们是如何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向外蠕动的!

上个世纪80年代我给同学讲授“历史认识论”,讲稿陆续整理成文。其中有些文章曾引起史学界同仁的关注,现一并收入本集。

我的老师和师辈的很多人健在,我在他们面前自然不敢说老,不

过我也是年近古稀的人了，来日或许还能做点事，但毕竟是夕阳黄昏。这次集结文稿对自己是一次清理，也是一次回顾。我45岁以前是在“运动”中渡过的，读书大抵是在“第四个单元”，即每天晚上10点钟以后。45岁之后迎来了难得的平静，但我的健康状况却很糟糕，心跳过缓，每分钟常常在五十次左右，最慢时仅三十多次。西医没有适当的对症药物，把我转给中医，中医似乎也没有成方，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每天熬一剂汤药，也真够烦人的。心跳过缓，引来供血不足，整日昏头昏脑，有时连眼睛也难得张开。可是客观形势逼人，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能停顿。医生告诉我，实在头晕时不妨倒躺一会，使血液流入大脑，可以缓解一下。我体验有效，于是在很多时候成为我的一种工作姿势，本集里有多篇文章就是在倒躺状态下读书和构思出来的。二十多年以来，心跳过缓与头昏的顽疾一直纠缠着我，少有清醒、轻快的时候，这个集子如果叫“昏头昏脑集”也许更为贴切。

多年来医生们一直遵循头疼医头的常规，让我服用各式各样的治头昏头晕的药，有些药很贵，吃起来很不忍心。前不久我又去医院，这位大夫与我所遇到的大夫不同，她问我睡觉是否打呼噜？我打呼噜有年了，上个世纪70年代两次千里“拉练”都伴有感冒咳嗽，从那以后开始打呼噜。在我们的传统里，鼾声如雷是壮汉的交响乐，自然没有引起疑问，更没有想到与头昏有什么关系。大夫用仪器给我检测，发现我打呼噜伴有呼吸暂停症，暂停时间最长的达1分钟，暂停的次数也比较频繁。这位大夫认为，呼吸暂停造成睡眠时供氧不足，是引起醒来头昏的重要原因之一。依照大夫的建议，我女儿从国外急忙买来一台自动调压“通气仪”，戴上果然有效，呼噜戛然而止，头昏现象也随之减轻，否则编选这本集子都很费劲。

汉代的主父偃以“倒行暴施”著称，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我岁数大了，不能按常规的路子走。这对我很有启发，我岁数也够大

的,四十多岁才真正入学,我虽然不能事事“倒行逆施”,但与那位大夫有相近之处,总爱思索自己能否从习惯了的“常规”向外跳一下?至于从哪一点起“跳”,常常是徘徊难定,不过有一点我是清醒的,即不能在沙地上跳。所以每“跳”之前都要尽力把基础打实,因此,我对我的立论还是满有信心的。不说别的,我抄的卡片就有数万张之多。以上拉杂碎语,是以为序。

刘泽华于南开园洗耳斋

2003年2月25日

# 目 录

自序 .....	(1)
----------	-----

##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述论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 .....	(3)
清官问题评议 .....	(13)
先秦时代的谏议理论与君主专制主义 .....	(27)
先秦法家立法原则初探 .....	(44)
先秦法家关于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 .....	(60)
先秦人性理论与君主专制主义 .....	(78)
先秦民论与君主专制主义 .....	(106)
先秦礼论与君主专制主义 .....	(126)
先秦诸子与统治者在政治上的自我认识 .....	(150)
道、王与孔子和儒生 .....	(192)
汉代“纬书”中神、自然、人一体化的政治观念 .....	(210)
论汉代的炎黄观念与帝统和道统 .....	(226)
圣人——中国传统文化的的本体 .....	(236)
论由传统政治观念向近代政治观念的转变 .....	(243)
论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 .....	(254)
论由崇圣观念向自由、平等观念的转变 .....	(269)



近代社团政党与中国公民意识的培养·····	(285)
学会作公民·····	(304)
王权至上观念与权力运动大势·····	(308)
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的整合·····	(332)

## 二、战国阶级身份述考

从春秋战国封建主的形成看政治的决定作用·····	(377)
论中国封建地主产生与再生道路及其生态特点·····	(399)
战国时期的食邑与封君述考·····	(417)
战国大夫辨析·····	(441)
战国时期的“士”·····	(452)
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	(473)
战国时期的奴隶仆役札记·····	(490)

## 三、历史认识论之检讨

——从教条主义中蠕动出来的历程

### 砸碎枷锁 解放史学

——评“四人帮”的所谓“史学革命”·····	(503)
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	(523)
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	(548)
“政治”概念大于“阶级”概念·····	(562)
历史认识论纲·····	(570)